



暮然回首

1985年，年逾而立的我在东风农场屈指可数的大厂——无线电厂任教育科负责人，拥有一间单人宿舍，像煞日脚蛮好过。屈指数来，在农场已有12个年头，顶替父亲的机会给了远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小阿姐，上调回上海的消息雷声小，雨点更难觅；小我2岁已“敲定”的女友在农场中学做英语老师，每个礼拜天来我处过一天“小家庭”式的生活……一切氛围的形成，似乎都给了我强烈的信号：我们可以结婚了。

结婚总得有一套家具，那时工资低，知青结婚的家具都是找来启东木匠做的，首先是省钱，其次是质量好，再则是，农场婚房大，家具摆得开。听人家说，做家具的木头要阴干一年才能用，不变形。所以，我在前一年就托朋友买来1.4立方米的柳桉木，专门放在一间空房里晾着待用。

其他有关结婚的事宜都在无奈中进行，唯一担心并经常做恶梦的是：在农场结婚，意味着要在农场扎根一辈子，回不了上海了。怎么办呢？双方都已是高龄知青，双方的爷娘比我们还急。

木头已晾干得差不多了，1984年春节过后回农场，决定过了“黄梅天”就请木匠来开工打家具。热心的知青邻居小计，帮我找来了两位启东木匠，看了好几套图纸，最终确定打一套当时蛮流行的调羹脚家具：大橱、五斗橱、写字台、夜壶箱、床架、木棚、三人沙发、茶几、四把椅子等。谈定工期一个半月，除了工资外，我得提供他们包吃包住。包吃的问题不大，宿舍离厂区仅5分钟自行车，食堂买好饭菜送回去就是；包住的问题也很快解决，我向后勤副厂长吴阿姨借了一间空房。难处是：木匠打家具时，没人督工，“拆烂污”怎么办？

挠头之余，我只能让母亲来做“督工”。母亲时年古稀逾五，不仅患有白内障、糖尿病，更要命的是，母亲还患有晕车船症。当我战战兢兢向母亲提出去崇明农场做“督工”的要求后，母亲竟一口答应。我知道母亲最喜欢我这个“奶末头”儿子。

我专程回上海陪母亲来崇明，一路上提心吊胆，为母亲备好了“晕海宁”。从家到吴淞码头换乘了3辆公交车，17路调18路，18路调51路，母亲竟然熬过来了！到了吴淞码头，我见母亲缓缓睁开眼睛，放心了一小半。我更大的担心是：从吴淞码头到崇明南门港2个半小时的双体客轮渡江，母亲能挺得住吗？尽管双体客轮比过去的单体船要稳得多，但对会晕船的母亲来说，不啻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艰难航程。为了儿子结婚的家具，母亲以最大的毅力和勇气踏上了客船的甲板。船舱座位上，母亲依然两眼紧闭，捂着花白头发的双手，时不时揉着太阳穴……终于，船靠码头。我搀扶着母亲再次踏上了去农场的“南风线”公交车……

“家具工程”开工了，毫无“督工”架势的母亲看着家具一件件竖起来，昏花的双眼每天荡漾着喜悦的涟漪。

有一天，我与未婚妻同去场部医院做例行的“婚前检查”，顺便去内科看望原在西南片卫生所就熟的朱医生。他经常跑市区，上层人头熟，消息多。听我说来“婚检”，即刻将我拉到一边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据可靠消息，这两年市里要解决农场大龄知青上调问题，我看你还是等一等。”

朱医生的一番话，就像迷雾海面上突然出现的一杆航标灯，令我兴奋不已。

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母亲，孰料，母亲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还要过两年啊？那这套家具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阿姆哎，调回上海，比十套家具还重要！你放心，我会处理。”

从此，这套毛坯家具就默默无闻立在那间空房里，不再安排油漆。不久，厂里领导同意我去上海华山路《上海农垦报》社实习，我便三铳不值二铳将这套毛坯家具拆零卖了，只是至今仍愧对母亲所付出的惊人毅力和一个半月的守候。



难忘往事

老知青相聚，40多年前插队入户，第一天推着拖拉机进光华山的有趣话题，总会被提起。

光华山是一座没有名气的丘陵山脉，位于赣中宜春地区境内。一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上山下乡运动，我和数十名上海知青，来到这个艰苦的山沟里，与当地老俵一起为农林建设奉献青春。

进光华山十分艰辛。从上海老北站出发，坐了将近一天一夜的火车，到了一个叫临江的小站，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背着行囊下了车。只见车站对面的公路旁，停着几辆贴着欢迎上海知青标语的拖拉机在等候，我深感纳闷，“拖拉机是用来耕地种田的，怎么能……？”

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身着旧军装的当地老俵，自称是徐队长。他报着知青的名字，吆喝大家上拖拉机。拖拉机车头后面挂了一个能坐十来个人的车斗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拖拉机是这样用来载人的，于是狼狈不堪地攀爬了上去。

“突、突、突”，拖拉机在山间坑

推着拖拉机进山

坑洼洼的红土地上歪歪扭扭地爬行，时而上坡，时而下坡。大家半蹲着，双手紧紧握住车斗的铁栏板，前俯后仰，东倒西歪。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是偶尔看到几只野狗在荒草丛中穿梭。

目睹此景此情，几位女知青开始呜呜哭泣。我们男知青还没劝说几句，自己却已两眼泪汪汪。老天仿佛也受到感染，突然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。徐队长连忙拿起车上的油布，为大家遮风挡雨。

在滂沱大雨的冲洗下，原本坎坷不平的泥巴路更是泥泞不堪。突然，拖拉机在爬坡时一只车轮陷入泥坑，不停地打滑，无法前行。

拖拉机手回过头，招呼我们几个男知青，站到拖拉机车头与车斗之间的连接处跳跃。“一二三、一二三”，我们使劲地跳着，这一招果然灵，打滑的轮子被跳出了泥坑，又开始慢慢爬行。不过，我们几个人脸上、身上都溅满了红泥巴，个个像个大花脸。看到我们这般模样，几位女知青顿时破涕为笑。

翻过一座小山头，徐队长站立

起来，指着前面一片杉树林，“再过十里地，就能到光华山啦。”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，都松了口气，开始交头接耳说话。只听到“嘭”的一响，拖拉机突然熄火，趴在半山腰。

拖拉机手手忙脚乱地点发动机，踩油门都没动静。于是爬进爬出，修了好几回，仍无济于事。一旁的徐队长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和拖拉机手一合计，决定让我们推着拖拉机进光华山，他说：“这是你们下放到农村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次考验。”

大伙儿不敢怠慢，放下随身行李，纷纷跳下拖拉机，挽起裤管、卷起袖口，随着徐队长的口令声，在风雨中，卖力地推起拖拉机。

知青的临时召集人小林，还别出心裁，让我们边推车边高唱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，他说，“我们要用革命歌曲，来激发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热情。”

歌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，拖拉机被推着在山沟中缓缓前行。大约三个小时，雨停了，我们也终于将拖拉机推进了光华山区。沈顺南



朝影夕晒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黑龙江省嫩江农场文艺宣传队以演出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而名噪一时。宣传队演员、乐队、舞美、灯光、音响等等，全都由来自于上海、哈尔滨、天津、齐齐哈尔和当地的知青担任。1972年下半年，我奉调从三分场来到宣传队，主要从事文艺创作编导工作，因此有了一个外号“小节目”。但上级好像还是喜欢《白毛女》。这年年底，奉命进入哈尔滨演出。那可几乎是“准专业”了。这张照片就摄于哈尔滨。其中有演员、乐队、舞美等。第一排中间下蹲者就是敝人。仿佛一个瞬间，已经四十三年多矣！马以鑫



人生驿站

1969年的1月16日，我和四位同学离开了家乡上海，乘坐火车千里迢迢下乡来到安徽濉溪县一个既偏僻又贫穷的生产队。当时，三位女生住的是一间较大的堂屋，中间是用高粱秆做的隔断墙。外间是厨房间，内间是女生寝室。而我和另一位男生住的则是饲养场里的一间小屋。当地的房间可谓相当简陋：墙是用泥砖砌成的，房顶是用高粱秆子加麦草搭建的；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门。

厨房间里有一个大炉子，炉子旁有一个风箱。煮饭烧水时需要边拉风箱边添燃料——如有烟煤或者玉米秆子；而我主动担当起烧火和拉风箱的工作。然而，无论是烧有烟煤还是玉米秆子，都会冒出浓浓烟雾。由于当地的房间只有门没有窗户，更没有烟囱，因此一旦煮饭烧水的时候，厨房间和女生寝室内就会充斥着大量的烟雾，好久才

“烟囱”的故事

能散去。所以，一到煮饭烧水的时候，女生们都到房外去“避烟”。我们两个做饭烧火的男生就遭罪了，但也没办法。

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实在熬不住了，便向队长提出，能否帮我们安装一个烟囱？“烟囱？”队长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一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比划着又说了一遍，队长终于明白了：“‘烟囱’，这个简单，马上就可以解决。”说完后，队长转身就走了，我还以为他去拿建造烟囱的工具呢。过了一会儿，队长回来了，只见他一手拿着一把军用刺刀，一手拿着一把锤子。我看着有些发愣，就凭这两样东西能建造出一个“烟囱”来？队长来到厨房间炉子旁边的泥墙前，用刺刀对着泥墙，然后用锤子对着刺刀锤打一阵子，再用刺刀不停地挖着。大约十分钟后，一个直径约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墙洞挖通了。队长

放下手中的刺刀和锤子，擦了把汗后憨厚地对我说：“小陈，这就是‘烟囱’啦。”我看着这个“烟囱”有些哭笑不得，但还是向队长表示了感谢。

自从有了“烟囱”——虽然根本不能称为“烟囱”，只是一个墙洞，但也发挥了通风和散烟的一些作用：每当煮饭烧水时，房间里的烟雾毕竟还是从“烟囱”里跑出不少，房间里也不像过去那么呛人了，女生们也不再外出“避烟”了。

就这样，简陋的房间和奇特的“烟囱”，陪伴我600个日日夜夜，直到1970年10月我招工进了城，这才离开了生产队。

陈抗美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